

# 村域经济视域下村庄劳动力流动研究

## ——基于 139 个行政村的实证分析

张 磊, 罗光强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 长沙 410128)

**摘 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村庄是农民实现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场域,村域经济是影响村庄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系统中全国 139 个行政村的样本数据,采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基于推拉理论视角研究了村域经济对村庄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村庄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公共品供给以及村庄的市场发育状况对村庄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人均耕地面积、农村日工资水平、村庄二三产业发展状况及村庄能人数量与劳动力流出成负相关。结合推拉理论,从制度设计、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制度设计方面强调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促进城乡要素按照价格信号自由流动,彻底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农民工城市就业、社会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延伸障碍;人力资本方面提出建立精准培训瞄准机制,重点对新生代农民工、初高中分流毕业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物质资本方面提出对农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改善进行投资,完善农民小额信贷制度,新增农业补贴重点支持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多源流改善农民资金约束和金融抑制问题。

**关键词:**村域经济;农民工;人口流动;乡城迁移;推拉理论;Logistic 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4.6;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6)05-0030-10

### 一、问题提出

劳动力流动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快速增长。据 2015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5BJY095);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16B287)

**作者简介:**张 磊,博士研究生(E-mail:1243699027@qq.com)

罗光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luguqi@163.com)

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长501万人,增长1.9%;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比上年增长211万人,增长1.3%;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867万人,比上年增长129万人,增长1.7%,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46.8%<sup>①</sup>。

人口流动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宏观上,诸多学者研究结论指出国家政策、法律、制度以及整体社会经济状况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就国外研究而言,诸如Lewis, Ranis&Fei, Todaro等学者均对此作出了经典的论述,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学者(Stark; Dercon)和机构(UNFPA)还分别对拉美和东亚(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地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上述结论<sup>①</sup>。就中国而言,建国之初为了配合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实行了严格的粮食统购统销和户籍管理等制度,农民被堵截在农业之中,双重管制导致了农村普遍贫困。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有条件的农民可以自带口粮进城务工,户籍政策开始松动,一些头脑灵活的农民开始离开土地进城务工;20世纪90年代初期,各种限制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逐渐放开,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迅猛扩张;长期以来我国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并由此而扭曲的产业结构和人口分布格局成为了我国劳动力迁徙的特殊动力<sup>②</sup>。而区域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则引导着劳动力的具体流向,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和迁移距离对劳动力迁移具有显著影响<sup>③</sup>;随着近年来迁入地城镇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吸引作用明显增强,以及空间距离等恒定因素的影响相对弱化,我国人口迁入重心开始北移,长三角都市圈而开始取代珠三角都市圈而成为21世纪以来省际人口迁入的主要地区<sup>④</sup>。

中观层面,社会网络、文化风俗、宗教习惯等也是影响农村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国外在此方面亦有较为翔实的研究,包括Shah运用指标分析法对科威特流动移民进行的研究<sup>⑤</sup>,在非洲大陆有Giesbert对肯尼亚西部村落<sup>⑥</sup>,Azam and Gubert对马里和塞内加尔的农民迁移做了深入研究<sup>⑦</sup>;另外,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sup>⑧</sup>与越南国家统计局(GSO)对越南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农村进城流动人口进行了系统跟踪研究,他们均证实了社会资本、文化风俗、宗教信仰在人口迁移中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利用不同国家地区的面板统计数据对“乡—城”流动人口状况进行了专题研究,比如Fuente, Nguyen, Amare分别对墨西哥、越南及泰国等地的面板数据分析,除了印证上述结论外,甚至还得出气候、生态、资源等多种相关因素对农村人口迁移的影响<sup>⑨-11</sup>。我国是一个具有明显“差序格局”状态的人情社会<sup>⑫</sup>,社会关系网络被人们当作获取社会资源的捷径,并对个人地位的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sup>⑬-14</sup>。现阶段农民工是我国的流动大军主力,其主要通过亲属、朋友介绍或引荐等非正式途径进入城市就业部门,进城后又寻求这些社会关系网的保护,以获取必要的社会资源和生存机会<sup>⑮</sup>,故丰富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农民工寻找到更加合意的工作,对提高他们自身地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sup>⑯</sup>。文化风俗、宗教习惯也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变量,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人口流动存在着明显差异,而文化风俗和宗教信仰则是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sup>⑰</sup>。

影响人口流动的微观因素主要包含流动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等因素。年龄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存在着倒“U”型关系,即在一定的年龄范围内,农民外出的意愿随年

龄的增长而增强,但超过该年龄阶段后,农民外出意愿减弱<sup>[19]</sup>;农民外出的性别差异体现在男性外出务工的意愿强于女性,不过近年来女性农民工数量开始逐年增长<sup>[19]</sup>;文化程度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既有水平差异也有性别差异,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对农民流动的意愿影响显著,但文化水平对女性则没有显著影响<sup>[20]</sup>。家庭方面,家庭劳动力数量、家中的未成年子女数量以及家庭资源禀赋等因素皆对农民的流动行为具有显著影响<sup>[21-22]</sup>。

已有文献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无论是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还是从经济层面到非经济层面都进行了深入和细致地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村庄是农民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场域,村域经济指在行政村域内各类经济主体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而形成的经济关系与规律的有机共同体,属于行政区域经济中“村级”级别的经济单元。村庄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公共产品供给以及市场发育状况是村域经济构成的关键要素<sup>[23]</sup>。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村域经济水平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决定着农民福祉,是影响农民外出务工行动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开始有学者从村庄层面关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规律,比如,李楠通过对 19 世纪 30 年代民国时期村域经济的计量分析,朱爱岚通过对四川和重庆三个村庄的田野调查都表明村域经济是影响农民流动行为的重要变量<sup>[24-25]</sup>。但遗憾的是,相对于其它层面的研究,考察村域经济对农民流动行为影响的文献却是凤毛麟角且有待深入,基于此,本文拟采用来自中山大学 2012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中的全国 139 个行政村样本,以进一步揭示村域经济对村庄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机制。

## 二、理论分析

本文采用国际上研究人口迁移的经典理论——“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19 世纪 80 年代英国学者 E.G.Ravenstein 在其《人口迁移之规律》一文中谈到了人口迁移的七条通识性规律;其核心思想是人口迁移多是从落后的农业部门迁移到较为发达的城市工商业部门,长距离迁移多是流向大城市,短距离迁移多是就近靠置在中小城市,迁移过程中还普遍存在跳跃性的从城市“外围—中心”现象;另外,较大型的人口迁移发生后往往会出现“补偿性”人口回流的现象。回溯我国近代以来的人口迁移现象,不难发现与之确有暗合之意。20 世纪 50 年代末,美国学者 D.J.Bogue 在吸收前人研究基础上总结性的提出了著名的“推—拉理论”;他认为“推力”是指那些原居地不利于可持续、均衡发展的包括失业、生态恶化、种族歧视等多种负面消极因素;而“拉力”是城市能为迁移者带来的优质生存与发展环境,包括较多的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优质教育资源等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具体到我国,不难发现,城乡二元结构与东中西部的较大发展差异,尤其体现在农村与城市在生产生活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上,使得农村居民不甘于忍受落后的乡村生活和恶化的生态环境,迁城意愿日益强烈。E.S.Lee 针对 Bogue 的理论缺陷对“推—拉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 Bogue 人口迁移中除了推力和拉力外,还存在客观上的阻力,包括迁移过程中迁移距离远近、语言文化习惯或者思

维惰性等各种障碍。而且 Lee 对推拉模型还做了延伸,认为推力和拉力都是相对而言的,比如对单个决策主体而言,在原地同样存在“值得留恋的东西”,包括乡情、家人团聚的快乐等方面,当然这些拉力远不及城市的拉力大。我国的乡城迁移阻力主要表现为尚未完全破除的“制度藩篱”,二元户籍制度及其在农民工城市就业、社会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延伸障碍仍然十分明显。因此,本文基于先贤学者的理论基础之上,运用推拉模型的经典思路并结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从村域经济视角对近年来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现象及特征因素进行分析,探寻在村域范围内对劳动力流动意愿影响的动力因素。

### 三、数据与方法

####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该调查聚焦于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内容涵盖教育、工作、迁移、健康、社会参与、经济活动、基层组织等众多研究议题,是一项跨学科的大型追踪调查。2012年7月至8月间,该中心在中国29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成功完成村居问卷303份<sup>②</sup>;其中包含全国农村村庄问卷175份,剔除不完整信息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139份。

在本文的139个行政村样本中,劳动力流入型村庄24个,占总体的17.3%,流出型村庄115个,占到总体的82.7%,劳动力流动数量不变的村庄0个。从村庄区位看,东部村庄50个,占36%;中部村庄38个,占27.3%;西部村庄51个,占36.7%;人均耕地面积最小值为0亩,最大值为27.21亩,人均耕地面积3.15亩;党员数量最少的村庄为12名,最多的村庄为278名,每个村庄的平均党员数量为63名。从村庄的市场发育程度来看,雇佣劳动力日均工资最低为30元,最高为290元,平均工资91.91元;村委离县城距离最近的为0.8公里,最远为110公里,平均距离为25.25公里。从产业结构上看,村内有二三产业的村庄51个,占36.7%;没有二三产业的村庄88个,占63.3%。

#### (二)变量选取

本文变量包含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村庄劳动力流动状况。已有研究表明村庄劳动力的流动是一种双向流动,既包含本村劳动力的流出,也包含外来劳动力的流入<sup>[20]</sup>;同时本文对劳动力的流动限定参考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标准,文中的流动劳动力人口特指年龄在15到65岁之间,外出时间在半年以上的本村户籍人口或在本村居住时间超过半年的外地人口,若本村流出人口大于流入人口,则将该村的劳动力流动状况界定为“流出村”;反之则为流入村;若流出和流入的劳动力数量相等,则为劳动力人口流动数量“不变村”。文中解释变量为村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公共产品供给以及市场发育状况等四个变量。其中,资源禀赋变量包含村庄区位、“村庄能人”数量、人均耕地面积三个指标,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党员数量作为“村庄能人”的替代指标;产业结构主要指二三产业情况;而村庄公共品的范围非常广泛,通常村庄道路状况能很好地体现出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整体水平,因此本文选用村庄

道路的硬化比例这一指标来体现村庄公共品的供给水平;市场发育状况包含村庄当地雇佣劳动力的日均工资和村委离县城的距离两个指标。变量具体设置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释义及赋值说明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指标	符号	赋值说明
被解释变量	村庄劳动力流动类型	村庄劳动力流动状况	y	“流入村” =1; “流出村” =2; “不变村” =3
		村庄区位	X <sub>1</sub>	“西部村” =1 “中部村” =2; “东部村” =3
	村庄资源禀赋	党员数量	X <sub>2</sub>	调查中的实际填报数量
		人均耕地面积	X <sub>3</sub>	同上
		村内雇佣劳动力日均工资	X <sub>4</sub>	同上
	村庄的市场发育程度	村委离县城距离	X <sub>5</sub>	同上
		村庄公共品供给状况	村内道路硬化率	X <sub>6</sub>
产业结构	有无二三产业	X <sub>7</sub>	“有” =1; “无” =2	

### (三) 模型构建

上文中推拉模型的理论可以概括为迁移决策是推力、拉力的成本收益函数,具体到村庄层面,村庄人口的流动行为则为村域经济所决定的劳动力收益的函数。

若令 r、i、s、m 分别表示村域内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公共产品供给以及市场发育状况,令 V 表示村域经济决定的劳动力的收益,则有:

$$V=V(r, i, s, m) \quad (\text{式 1})$$

式(1)表明劳动力的收益水平由村域内的各经济要素决定。

再令 V<sup>e</sup>表示劳动力的期待收益 M<sub>i</sub>表示劳动力个体流动的决策行为,则有:

$$\begin{cases} v > V^e & M_i = 0 \\ v < V^e & M_i = 1 \end{cases} \quad (\text{式 2})$$

式(2)中 M<sub>i</sub>=0 表示,劳动力决定留在村庄内;M<sub>i</sub>=1 则表示劳动者会离开村庄,该式表明当劳动者留在村庄内的实际收益大于预期收益时,劳动者会选择留在村庄,反之则选择离开村庄。

数据整理后发现,139 个样本村的劳动力流动仅存在流入和流出两种类型。鉴于这一数据特征,本文选取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揭示村域经济各变量对村庄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为逻辑概率分布函数,通常设某个事件的发生概率为 P,不发生的概率即为 1-P。记有  $x=(x_1, x_2, x_3, \dots, x_{p-1})^T$ , x<sub>i</sub> 为该事件发生的某一影响因素, P(x) 表示该事件的发生概率,具体到本研究中则有  $\text{Logit} \frac{p(\text{流出})}{p(\text{流入})} = b_0 + \sum_{i=1}^p b_i x_i$ , 其中 b<sub>0</sub> 为截距项, b<sub>i</sub> 为第 i 个因素的偏

相关系数。

## 四、结果与讨论

### (一) 运算结果

表 2 为影响村庄劳动力流动的各个因素的回归结果,计量结果显示各检验统计量取值皆合意,各个影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皆显著,表明本文选取的变量和计量模型对村庄劳动力的流动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表 2 以流入村为参照的村庄劳动力流动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 b	标准误 S.E	Wald 值	Exp (b)
村庄区位 (以西部村为参照)	东部村	-2.728**	1.351	4.077	0.065
	中部村	-1.004	1.510	0.442	0.366
党员数量		-0.016**	0.007	5.411	0.984
人均耕地面积		-0.259***	0.096	7.212	0.772
村内雇佣劳动力日均工资		-0.027***	0.010	6.685	0.973
村委离县城距离		0.059**	0.031	3.698	1.061
村内道路硬化率		-0.019*	0.011	3.117	0.981
有无二三产业 (以没有为参照)		-1.522**	0.717	4.506	0.218
Chi-Square				59.471***	
-2Loglikelihood				64.884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在村庄资源禀赋的各变量中,村庄区位中的东部村的回归系数为-2.728,东部村庄的劳动力流出明显低于西部村庄,而中部村与西部村庄相比则并不显著;党员数量的回归系数为-0.016,表明劳动力流出村庄的概率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而降低;人均耕地面积的回归系数为-0.259,人均耕地越多的村庄劳动力流出明显减少。由于资源禀赋、历史背景、技术条件和初始发展水平的差异,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距;现阶段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整体发展程度高于西部地区,基于推拉理论模型,劳动力迁移主要是流向工资和福利较高的工商业发达城市地区;因此相对于东中部村庄,西部村庄成为主要的人口流出地。土地是农村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人地关系紧张的村庄,土地连村民的生存功能都难以满足,更不谈满足村民的发展需要了,人多地少是迫使农民离开村庄的重要因素。村中的党员通常是政治觉悟较强,文化程度较高,头脑比较灵活的农民精英的代表,是乡村能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能人对村民具有较强的创业带动作用 and 示范作用,因此能人较多的村庄通常其经济状况相对要发达些,村民的就业和收入也更加多元,村民流出村庄的意愿相对较低。

在村庄的市场发育程度变量中,当地的雇佣劳动力日均工资越高,村庄劳动力的流出减

少。这是因为,如果能够在本乡镇地域内通过劳动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农民留在村庄就可以兼顾土地和家庭,留在村庄无疑是农民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而县城距离对村民的流出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意即离县城的距离越近,离开村庄的劳动力越多,这很可能是因为离县城越近的村民就越有可能获取非农就业岗位就近就业的结果。不过,也有研究表明城郊村的人口流出明显低于偏远村<sup>[7]</sup>,一个更可能的解释是城镇距离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存在着年龄差异或者文化程度差异,但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无法对这一假设进行检验。

村内道路硬化路面的比例越大,劳动力流出村庄的概率减小,表明村庄的公共品供给对村庄人口流动具有重要影响。虽然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投入,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供求结构失衡的矛盾依然突出。村庄的公共品供给不但直接影响到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还关系到农民的就业增收,因此农民“逃离”村庄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村庄公共品供给不足的无声抗议。

村庄产业结构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就业增收,在有二三产业的村庄,劳动力的流出明显低于没有二三产业的村庄。在没有二三产业的村庄,农民收入以农业为主,但农业产业周期长、风险大,尤其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农业比二三产业的收益要低得多,因此没有二三产业的村庄,农民更倾向于流出村庄以寻求收益更高的非农就业途径。村庄的非农产业不但能直接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农民收入,还能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资本和市场,延长农业的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农业竞争力,实现村庄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增强村域经济实力。

## (二)讨论

通过上文的回归结果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现阶段的“乡—城”人口流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身份特征。一方面体现为我国城乡二元分割与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明显并存,村域经济发展内驱力不足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表现为我国农村人口流动主体类别单一,农民工仍占流动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值得一提的是,在村域层面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不止上文所述,比如在家庭层面的特征因素,家庭有无需要照顾的老人与子女均对家计决策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鉴于 CLDS 数据的采集局限和统计口径问题,故而难以对上述问题作出数理上的论证。基于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阶段与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围绕对“乡—城”劳动力迁移可以引出以下几点讨论:

首先,鉴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阵痛,势必会影响在传统工业部门谋生的老一代农民工可持续就业生计;而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存在着较大的“心态”与“技术”差异,因此,加快探究并廓清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流动的特征因素将变得异常重要。

其次,建立城乡联动、激励相容的农民工市民化动力机制将是应然图景。农民工市民化是变无序的“盲流”为有序的人口“迁徙”,变“务工—挣钱—返乡”的模式为“务工—进城—发展”的可持续人力资源配置方式。

再次,在社会管理方面,摒弃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应该由当前的防范性、限制性管理到

服务型管理转变,尤其注重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侧进行改革,改变当前农民工集中于建筑领域的现状。

##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表明,村域经济是影响村庄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总的来讲,村庄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公共品供给以及村庄的市场发育状况对村庄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人均耕地面积、农村日工资水平、村庄二三产业发展状况及村庄能人数量与劳动力流出呈负相关。随着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乡城劳动力流动为农民增收、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村庄劳动力的大量流出也带来了诸如“空壳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土地抛荒”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如何促使乡城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又不以牺牲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是当前及今后时期政策研究的着力点。

本文政策启示针对乡—城流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推—拉理论视角提出政策建议,总的来讲是增加农村适宜外出务工人员推力,破除城乡要素流动制度藩篱,减轻迁移过程中的阻力,深化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建设,降低人口流动成本,并为持续城镇化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注重顶层设计,加强科学制度供给。“理念优于制度,制度优于技术”<sup>[28]</sup>。统筹城乡发展首要前提是进一步推进制度改革,为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扫清制度障碍。首先,着力彻底破除城乡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延伸藩篱,促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并充分释放人口流动势能;取消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施行居住证制度,在城市就业、社会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障碍亟待破除。其次,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生产要素的流动应该遵循价格信号进行最优效率的组合;尤其是在农产品、土地资源市场价格方面,探索农村土地市场与国有土地市场同等入市,让改革红利惠及更多农村民众。再次,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加快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尤其是医疗和农村养老服务方面。同时,注重农村基层治理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领导能力,改善乡村基层治理水平,是村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保障。

第二,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开展多源流精准化教育培训。首先,必须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力度,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程度和乡村教师待遇;注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大力发展乡村社区教育。其次,建立更加精准的人力资本投资瞄准机制,尤其是对新生代农民工、初高中分流毕业生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对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社长在内的新型农业规模经营主体进行精准化培训,鼓励他们参与“半工半读”接受职业教育,提高他们的市场观念、团结协作意识和生态高效农业的技术能力。

第三,加大农村物质资本投入,提高农村要素配置效率。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改善的投资力度,尤其是在村庄道路硬化和饮用水工程方面更是紧迫。其



次,现有农业补贴政策逐步向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对自愿退出宅基地使用和农地承包的农户应该适当给予奖励;政府出资建立土地流转平台,鼓励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种植大户以及涉农企业对散户的土地流入,促使农地的又好又快流转。再次,国家在顶层设计层面还应注重建立健全农村资本市场,完善农民小额信贷制度,推进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为农民投资和创业而创造安全便利的金融环境。

#### 注释:

- ①本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
- ②本段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http://css.sysu.edu.cn/News/Show/1008>。

#### 参考文献:

- [1] GSO & UNFPA. The 2004 Vietnam migration survey: Internal migration and related life course events[R].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and 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2005.
- [2] 蔡昉. 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J]. 中国人口科学, 1995(6): 8-15.
- [3] 王格玮. 地区间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基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04(3): 77-95.
- [4] 王桂新, 潘泽瀚, 陆燕秋.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 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5): 1-13.
- [5] Shah, N.M. Relative success of male workers in the host country, Kuwait: Does the channel of migration matter?[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0, 34(1): 59-78.
- [6] Giesbert, L. Seeking opportunities: Migration as an income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household in Kakamega district in Kenya, Working paper[R].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2007, 58(8): 201.
- [7] Azam, J.P., & Gubert, F. Migrants, remittances and the household in Africa: A review of evidence[J].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006, 15(2): 426-462.
- [8]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FPA). Internal migration: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etnam[R]. Th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in Viet Nam, Accessed August 2011.
- [9] Fuente, A.D.L. Remittances an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in rural Mexico[J]. Journal of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6): 828-839.
- [10] Nguyen, N.P., Tran, N.T.M.T., Nguyen, T.N., & Oostendorp, R. Determinants and impacts of migration in Vietnam, Working paper[C]. Development and Policies Research Center, 2011(1): 26-27.
- [11] Amare, M., Hohfeld, L. & Waibel, H.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employment quality: A case study from Thailand. [J].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2012, 29(1): 58-80.
- [12]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13] 张海东, 杨隽. 转型期的社会关系资本化倾向[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0(1): 53-58.
- [14] 边燕杰, 张文宏. 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2): 77-91.
- [15] 孙立平. 断裂[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16] 唐灿, 冯小双. “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J]. 社会学研究, 2000(4): 72-86.
- [17] 迟松剑, 刘金龙.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原因差异的民族因素影响分析[J]. 人口学刊, 2012(1): 84-90.
- [18] 赵海, 彭代彦. 农村劳动力非农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231 户的调查[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

报,2009(2):133-137.

- [19] 陈晓华,黄延信,姜文胜.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问题及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05(8):29-34.
- [20] 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7(2):37-42.
- [21] 蔡哲,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1999(10):62-68.
- [22] 都阳,朴之水.迁移与减贫——来自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J].中国人口科学,2003(4):56-62.
- [23] 王景新.村域经济转型发展态势与中国经验[J].中国农村经济,2011(12):4-15.
- [24] 李楠.近代农民离村决定因素的再讨论:一个历史计量学的视角[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2):10-22.
- [25] 朱爱岚.离村与不离村:发现与思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35-41.
- [26] 龚维斌.农村就业市场的分层性——对华北一个村庄人口流动的实证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38-45.
- [27] 邓大才.城乡经济——武汉市城乡居民就业与增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28] 田国强,陈旭东.中国改革:历史、逻辑与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万东升

## The Mobility of Village Labors under the Horizon of Village Economy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of 139 villages in China

ZHANG Lei, LUO Guangq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villages in the countrysid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villagers' na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Therefore, the village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mobility of the villagers. Based on the CLDS sample data of 139 villages in China, this thesis analyses the effect of the village economy on the mobility of the village labors with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Findings show that the endowment of resource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nd the market maturity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mobility of the villagers. Then, the thesis puts forward some related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system design, human capital and material capital. Firstly, it is suggested to emphasize the boundary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and promote the free flow of the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as per price signals. Secondly, it is advisable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rural human capital and focus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econdary school graduates, family farmers to carry out targeted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Thirdly, governments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nd improve the farmers' small credit system. The agricultural subsidies newly increased should support family farms and big planters. 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o take variety of methods to improve farmers'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financial repression.

**Key words:** village economy; migrant workers; population mobility; rural-urban migration; push-pull theory; logistic regression